

---

# 历史记忆研究的东西方对话

——“记忆与纪念,东方与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里峰 戴 朴

---

[关键词] 历史记忆; 纪念; 中心与边缘; 反记忆

[中图分类号] K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15)01—0202—06

[作者简介] 李里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戴 朴,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210023

1984至1992年,法国最著名的学术出版社伽利玛(Gallimard)陆续推出由年鉴派第三代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主编的七卷本巨著《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sup>①</sup>。以此为标志,由另一位法国人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1920年代开创的集体记忆研究传统,迅速进入西方学界的主流阵地,成为近年来最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之一。研究者所用的名目不一,或称历史记忆(historical memory),或称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或称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其具体意涵略有差异,研究旨趣则大体相似。

或许是巧合,在《记忆之场》第一卷出版30周年之际,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于2014年2月20—21日举办了一次以“记忆与纪念,东方与西方”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由墨尔本大学国际研究与培训基金会(IRRTF)和墨尔本大学历史与哲学学院(SHAPS)共同主办,来自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德国、瑞典、中国、印度尼西亚、伊朗等国家的20余位学者出席会议,围绕战争记忆、殖民地记忆、暴力记忆、记忆景观、记忆与反记忆等主题展开深入探讨,并就历史记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合作研究和共同出版的可能性等进行了交流。作为与会者之一,笔者亟愿与国内同仁分享这一前沿领域的最新进展,因撰此文略作介绍。

## 一 记忆的中心与边缘

记忆本是心理学的研究议题,在哈布瓦赫及其后继者的推动下逐渐进入社会学家的视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对纳粹屠犹的研究和反思,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乃至哲学家也开始关注历史记忆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记忆研究一直聚焦于西方世界内部,而对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关注较少。但最近十多年来,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观,有关殖民地记忆、战争记忆、暴力记忆、冷战记忆的研究在中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同时也在前苏联地区和中、东欧地区流行开来。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记忆研究的西方中心色彩,反思性地探讨了不同国家、文化对过去的认知、理解和记忆,极大地丰富了记忆研究的成果。

---

<sup>①</sup> 中译本有《记忆所系之处》,台北行人出版社2012年版。

墨尔本大学的 Kate Darian - Smith 在《澳大利亚的记忆和历史: 国家关注与国际联系》(Memory and History in Australia: National Preoccup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s) 中,对澳大利亚的历史记忆研究作了较全面的述评。她回顾了记忆研究在澳大利亚兴起和发展的历史,介绍了涉及个人、社会及制度的历史记忆研究的方法论传统,指出澳大利亚的记忆和纪念研究在公共生活与政治文化中发挥的先锋作用,犹胜于其在纯粹学术研究中扮演的角色。作者尤其强调近年来澳大利亚记忆研究焦点的转移。以往研究者主要聚焦于公共领域中的国家认同,如今的研究热点转向了殖民地记忆、战争记忆、纪念活动和纪念仪式等,而记忆研究的国际比较、迁移者与离散者记忆、历史记忆中的人权问题,则为记忆研究指引了新的方向。

英国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的 David Lowe 和 Tony Joel 介绍了他们反思冷战记忆的新书《记住冷战: 全球竞争与国家故事》(Remembering the Cold War: Global Contest and National Stories)。他们指出,虽然就传统定义而言,冷战是一种非常不同的战争,充满了诸如核危机等新鲜元素;但是与其他战争相似,冷战也有其加害者和受害者,而后者同样需要通过讲述、记忆、纪念来确立自己受害者的身份。在关于冷战的记忆中,各方都在全球化和地缘政治的背景中驾驭自己的故事。如果将注意力从全球竞争转向地区性的暴力和镇压,从西方转向东方,跨越北约和欧洲中心的意义,从更宽泛的角度来定义冷战,冷战将为如今关于历史记忆和纪念的研究提供一个更令人满意的观念之桥。

德国耶拿大学(Friedrich Schiller University Jena)的 Joanna Wawrzyniak 在《记忆的区域: 在全球视角下反思东欧记忆框架》(Regions of Memory: Reflecting on Eastern European Memory Frames in Global Perspective) 中,对欧洲历史记忆研究的区域化和跨区域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作者从她生活的中、东欧空间出发,批判性地分析了最近呈增长态势的欧洲历史记忆研究中的跨区域特征,提出可以将一个特定区域(譬如东欧)的理论化主题作为一种可能的替代性框架,来展开历史记忆研究。东欧直到 1989 年为止始终为各种形态的暴力所围绕,因而可以历时性地把东欧视为 20 世纪跨国界暴力的空间。从长时期的群体暴力、分裂和多样性的经验来看,在中东欧历史记忆研究中,区域性、类属性特征也许比跨区域特征更为重要。

关于印度尼西亚殖民地记忆的两篇论文,进一步彰显了记忆研究向边缘世界转移的倾向。印度尼西亚加扎马达大学(Universitas Gadjah Mada)的 Bambang Purwanto 在《历史是(不)可贩卖的: 战争记忆和印尼历史编纂中的国家叙述问题》(History is (not) for Sale: War Memory and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Narrative in Indonesian Historiography) 中,检视了印度尼西亚关于 1945—1949 年荷印战争(或称印尼独立战争)的国家历史叙述,并对近年来相关争论所涉及的事件、趋势和模式进行了辨析。文章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印尼当局要求荷兰进行官方道歉、并承认 1945 年 9 月 17 日为印尼独立日的持续努力;二是针对这一时期荷兰军事行动要求赔偿的各种诉求;三是印尼官方、民众和知识分子对荷兰政府处理殖民地时期屠杀事件的不同反应。

墨尔本大学 Katharine McGregor 的《印尼独立战争中韦斯特林大屠杀的意义重构》(Reconceptualising the Meaning of the 1946—1947 Captain Westerling Massacres during the Dutch - Indonesian Independence War) 则聚焦于韦斯特林大屠杀这一具体事件,探讨印尼独立战争的历史遗留问题。1946 年 12 月,为镇压东印度尼西亚政府反对派,韦斯特林上校指挥荷兰特种部队杀害了数千平民,这是荷兰在印尼殖民地最臭名昭著的暴行之一,但直到 2012 年前,屠杀事件的幸存者都不曾试图伸张正义、寻求补偿。作者利用历史记录和当代报告,考察了印度尼西亚对相关问题解决框架的变化,并对如下问题进行了反思:国际上不断变化的人权犯罪观念在印尼产生了何种影响?在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书写中,是哪些人为印尼独立献出了生命并作为国家烈士被纪念?是什么促使幸存者家庭在多年以后要求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借此,作者对印度尼西亚的殖民地记忆和战争记忆作出了新的诠释。

正如纳粹屠犹是记忆研究在欧洲兴起的重要因素之一,南京大屠杀也是中国记忆研究的一个关键性议题。南京师范大学张连红在《南京大屠杀的社会记忆》中,描述了大屠杀对南京市民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以及社会各界对大屠杀的记忆。1980 年代以来,中国学者除了探讨相关史实外,

也开始反思大屠杀对幸存者带来的生理和精神创伤,以及对中国社会、城市文化和普通民众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京市民对大屠杀的记忆逐渐超越最初的复仇情绪,形成了“落后就会挨打”的民族主义信念和“日本人民也是战争受害者”的人道主义情怀。作者尤其强调,中国政府和公众不应该继续把幸存者当作见证大屠杀、驳斥日本右翼的武器,而应该对他们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治疗和抚慰战争的创伤。同时,也需进一步发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社会记忆功能,从人类文明的角度反思这一历史悲剧。

## 二 记忆与反记忆

在集体记忆研究的开山之作《论集体记忆》(*On Collective Memory*)中,哈布瓦赫毫不含糊地指出,个体记忆只有在集体(诸如宗族、阶级、民族、国家)框架中才能形成并受制于它,由他开创的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研究传统,从一开始就蕴含着强烈的建构论(constructionism)色彩。但近年来一些学者又开始反思建构论的局限性,转而强调个体记忆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民间/边缘记忆对于官方/主流记忆、个体记忆对于集体记忆的游离与抵制。本次研讨会上,几位学者以不同个案诠释了记忆与反记忆的辩证关系。

南京大学李里峰的《从苦难记忆到革命记忆:1940年代华北土改中的诉苦》以“诉苦”为例,探讨了中国革命中的记忆塑造问题。作者指出,在中国共产革命进程中,乡村民众的革命记忆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革命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精心塑造的结果,土改运动中的“诉苦”就是一种革命记忆的生产术。在土改运动中,党和国家将私人化的苦难经历和苦难记忆变成一种当众诉说的公共话语,并借助行之有效的氛围营造、情绪调动、逻辑归罪等策略,对乡村民众的苦难记忆进行了仪式化、情感化和同质化改造,使之融入阶级、革命、解放、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个人的、多元的苦难记忆被集体的、同质的革命记忆所收编,成为革命政党及其政权合法性的有效来源。

迪肯大学 Dianne Hall 的《血腥之桥:爱尔兰的暴力、性别与记忆》(*“The Bloody Bridge”: Violence, Gender and Memory in Ireland*)从一座破桥开始北爱尔兰的记忆探索之旅。1641年,爱尔兰天主教徒发动针对新教徒移民的叛乱,暴力行为失去控制,发生了对平民的大屠杀。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在内的一群新教徒,被驱往阿玛郡波塔镇(Portadown in County Armagh)班恩河(River Bann)上一座破败的桥梁,在那里被杀害。这篇论文还分析了大屠杀记忆中蕴涵的性别意义,并通过检视幸存目击者的叙述探讨了一些饶有趣味的问题,诸如关于大屠杀的谣言是如何传播的,这座桥本身又是如何借由鬼魂传说、污染之鱼和其他超自然现象,在叛乱之后令人困扰的年代里成为一个记忆之场的。

墨尔本大学 Rachel Hughes 的《红色高棉法庭、“民事当事人”与柬埔寨离散者》(*The Khmer Rouge Tribunal, “Civil Parties” and the Cambodian Diaspora*)以红色高棉法庭的相关实践为例,探讨了受害者法律身份的确认问题。红色高棉法庭的正式名称为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ECCC),是由柬埔寨政府和联合国共同设立的一个混合型国际犯罪审判机构,负责对红色高棉时期的大屠杀进行调查和审理。法庭设有受害者支持部(VSS),受害者可以起诉方或民事当事人(civil parties)的身份,寻求法律上、经济上、道义上的补偿和帮助。在当前的ECCC二号案中,已有超过一百名柬埔寨离散者成功获得了民事当事人的资格。通过这项研究,作者提出了受害者的法律身份应该如何确认,也对受害者参与审判所引发的关于大屠杀记忆的新问题进行了反思。

印度尼西亚阿萨-瓦卡纳基督教大学(Universitas Kristen Artha Wacana)的 Mery Kolimon 在《纪念与治疗:在国家与地方机制之间寻求平衡》(*Commemoration and Healing: Finding a Balance between State and Local Mechanisms*)中,检视了1965年印尼东努沙登加省(East Nusa Tenggara Province)反共悲剧留下的历史阴影。在这年9月30日的军事政变及随后的血腥镇压中,数十万印尼共产党员和普通华人被杀害。作者指出,暴行的牺牲者不仅是个人和家庭,而且是整个国家,因为它造就了恐怖,压制

了人们对权力滥用的批判立场。由于事件中加害者的背景和动机非常复杂,只有各方共同努力,才有望治疗暴力事件留下的创伤。文化机制是在个体层面进行治疗的途径之一,但仅靠文化是无法从结构上解决问题的,因为地方文化本身也受到了国家(新政权)及宗教权威的渗透和歧视。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的Yasmin Saikia作了题为《加害者记忆:孟加拉1971年战争的再叙述》(Perpetrators Remember: Re-Telling the 1971 War of Bangladesh)的主题演讲。1971年印巴战争(孟加拉国就诞生于这场战争)对印度来说代表着对巴基斯坦军事行动的成功,对巴基斯坦却象征着孟加拉人的背叛。但在作者看来,两种民族主义叙述都未能揭示这场战争高昂的人力成本,所以她选择“被遮蔽的叙述”视角,描述了大量巴基斯坦士兵、印度士兵和孟加拉武装者强奸、拷打妇女的例子,而在官方的历史教科书中,这些男人都是战争英雄。Saikia的主题演讲,是依托其新著《女性、战争与孟加拉的形成:记忆1971》(Women, War, and the Making of Bangladesh: Remembering 1971)展开的,该书通过战争幸存者的回忆,传达了那些原本被视为无言者的强有力的声音,她们作为政治和社会变迁的见证人、社会工作者、照料者和战士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和见闻,叙述中涉及强奸、社会地位、公民身份、战后婴儿潮等一系列问题。

墨尔本大学Jason Sze Chieh Ng的《共产党人回忆录中的马来亚》(Remembering Malaya through Communist Memoirs)提供了另一个反记忆的例子。1989年《合艾和平协议》(Haadyai Peace Agreement)签署之后出版的几部马来亚共产党员回忆录,挑战了马来西亚国家建构的神话叙事,它们不仅是徒劳挣扎的怀旧,更反映了作者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哲学。这些前革命者采用共产主义视角,拒斥以叛乱为基调的官方主流叙述,而以马来亚民族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为叙述框架,强调自己为实现社会理想付出的努力,使读者既作为观察者、也作为参与者感受到一个全新国家的变迁。这些自传,不仅让那些几乎被遗忘的前革命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且通过将读者投射到过去的时代,建构了新的文化场景。

### 三 记忆的书写与讲述

关于记忆的本质及运行机制,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绝大多数人同意,记忆须以特定的载体为中介才能形成、扩散和传承。文本与口述,是最常见的两种记忆载体。历史学家一般较看重文本记载,认为这是经过时间考验而留存下来的宝贵财富,被确定的外在形式所包裹,是记忆传承和后人研究记忆的真实凭据;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则往往更青睐人们的回忆和讲述,不仅讲述内容是考察历史记忆的依据,而且讲述者的表情、语调、场景等同样是记忆的表征。几位与会者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文本与口述在历史记忆研究中扮演的角色。

墨尔本大学Alison Lewis的《后共产主义德国和斯塔西档案中的加害者记忆》(Perpetrator Memory in Post-Communist Germany and the Stasi Archive),对斯塔西档案中的三份加害者文本进行了饶有兴味的解读。斯塔西即成立于1950年的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总部设在东柏林,负责搜集情报、监听监视、反情报等业务,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之一。苏东剧变之后,后共产主义德国对前民主德国的遗产进行了彻底清理,二十多年前的斯塔西文件被公开,使人们可以看到当年那些加害者,尤其是所谓非官方合作者(unofficial collaborators)或告密者的相关分类资料。作者选取三份材料作了细致分析:一部关于一位不情愿的长期告密者作家的纪录片,一部柏林地下告密者的自传,一部受害者成分比告密者更重的作家的回忆录,希望借此推动德国的加害者记忆研究。

墨尔本大学Shan Windsript的《革命的阴影“文革”日记中的预期记忆、文本纪念和过往记忆》(Shades of the Revolution: Prospective Memory, Textual Monumentality and the Past Memories in the Diarie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对普通人的“文革”记忆进行了再探讨。她认为,以往关于“文革”记忆的研究大多是一种回溯性(retrospectively-oriented)的过程,即在当下语境中重构过去

的事件,其焦点在于“文革”结束之后(而不是“文革”期间)人们如何记忆“文革”。这篇论文则借助对一批普通人“文革”日记的文本分析,试图探讨在“文革”运动期间过去是如何被记忆的,进而揭示记忆和纪念的预期性(prospective)特征。透过这些日记,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记忆光谱的复杂性,进而理解对未来行为和意图的愿景,如何通过记忆实践对当下的身份认同产生影响。

莫纳什大学 Nathalie Nguyen 的《南越军人的记忆》(The Memories of South Vietnamese Servicemen) 基于澳大利亚的一项口述史计划,探讨了现居澳大利亚的前越南女兵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这批口述资料现已被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收藏。越南战争结束后,超过 200 万越南人离开祖国,流亡到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地,这是 20 世纪后期最引人注目的流亡人群之一。许多来自越南共和国武装部队(RVNAF)的老兵都在战后被关押,或者在新政权下遭到政治歧视,最终变成了难民和移民。这些前越南女兵的口述资料,讲述了她们在军中服役的情况、对南越的记忆以及当前越南的联系。她们的叙述揭示了与越南的复杂关系,构筑了军旅岁月、离队去国、战后的困顿、移民的挑战以及归乡之旅等丰富的记忆。

墨尔本大学的 Mammad Aidani 同样借助口述史方法,着力探讨男性的战争记忆和战争叙述。他在《苦难思考:伊朗男性的两伊战争叙述》(Reflections of Pain and Suffering: Iranian Men's Narratives of the Iran - Iraq War) 中,讨论了普通伊朗男性如何讲述战争、暴力和离散的经历,以及他们如何赋予自己经历的战争苦难以社会意义。作者指出,中东背景的男性经验和遭遇过各种形式的黥武主义,男子汉气概和男性尊严经常是通过服兵役来得到体现,这类军事化的经验显然深刻影响了男性对他们周遭世界和地区的解释与认知。经历战争的伊朗男性如何以此类经验为材料,详述他们的人生历程和战争经验、政府的暴力和自己的磨难,为学者们探讨社会磨难和暴力创伤对历史记忆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黄玉婷的《再现眷村:从悲情叙述到喜剧〈宝岛一村〉》(Representing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From Tragic Narratives to the Comedic Play "The Village") 以话剧《宝岛一村》为分析对象,展示了文本叙述中的记忆转换。“眷村”意指军人眷属的村落,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当局为安置 1949 年前后由大陆迁台的国民党军人及其家属而在各都会县市修建的房舍。80 年代初,政府为了新的城市建设计划,决定拆除这些眷村,随后涌现出大量表现眷村生活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赖声川和王伟忠 2008 年创作的话剧《宝岛一村》,代表着眷村文化被接纳的转折点。和过去强调大陆移民苦痛和无助的作品不同,赖声川等人采用一种幽默的手法去处理大陆流亡者的经验、焦虑和认同危机,一方面揭示了独特的眷村经验如何汇入台湾社会的集体记忆,一方面又扭曲了某些历史真实并低估了台湾族群关系的复杂性。

#### 四 记忆景观与纪念

历史记忆的载体是丰富多样的,除了文本记录和口头讲述之外,公墓、遗址、纪念碑、纪念物等实物景观,同样负载着公众对特定历史的记忆和纪念。当然,这些景观本身不会发声,需要研究者借助敏锐的洞察及适当的工具,方能从中读出历史记忆的丰厚意涵。

墨尔本大学 Kathryn Smithies 的《当记忆、纪念和社群构思一件纪念物:解读米德尔顿教堂的弗洛登之窗》(When Memory, Commemoration and Community Conceive a Memorial: Understanding Middleton Parish Church's "Flodden Window") ,细细讲述了一件战争纪念物的前世今生和意义流变。1513 年,一支英格兰军队在南苏格兰边境的弗洛登之役中击败了入侵的苏格兰军,其中包括一群来自兰开夏郡米德尔顿的弓箭手。而在八年前的 1505 年,米德尔顿的一个弓箭手团体曾委托当地教堂制作了一扇着色的玻璃窗,这块留存至今的玻璃上刻有十七名弓箭手的名字。尽管这扇窗户在战役之前就造好了,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在上面留名的弓箭手参加了弗洛登之役,但几百年来它一直被称为“弗洛登之窗”,并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战争纪念物。作者回溯了弗洛登之窗从 16 世纪初直

到2013年(弗洛登之役500周年)的漫长历史,探讨了弓箭手的兄弟情谊、战士与教堂的关系等社会文化意涵。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的Gabriela Welch在《东欧的战争死难者与军人公墓的重建》(War Dead and the Restoration of Military Cemeteries in Eastern Europe)中,比较了德国、罗马尼亚和俄罗斯对战争死难者的祭奠,分析了这些国家在摩尔多瓦重建战争公墓的情况。这篇论文揭示了过去的战争盟友或对手如今怎样开展合作,怎样试图通过对战争死难者的重新掩埋和记忆,去克服近几十年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巨大隔阂。作者强调,对战争死难者的搜寻发生在这样一种时刻,即这些国家正在慢慢接受自己的极权主义历史,同时也正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寻求承认。对死难者的私人纪念和政治纪念开始合流,形成了对“神圣性”过去或排他性国家理想的重新叙述。

墨尔本大学Steven Welch的《德国的逃兵纪念碑》(Deserter Monuments in Germany)考察了颇为独特的德国逃兵纪念碑,指出其对于传统士兵价值观和既有战争纪念的反思意义。德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建有逃兵纪念碑的国家之一。1980年代,为对抗北约,兴起了德国和平运动,在此背景下,许多德国城市开始修建逃兵纪念碑,到2012年全国已有25座。这些纪念碑分为两类,一类专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逃离纳粹军队的士兵,另一类则是为了表彰逃离战场的行为准则。作者指出,这两类纪念碑其实都具有反纪念(counter-monument)的特质,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对纳粹逃兵的成见,促成2002年5月为这些人恢复名誉,也激发了民众对纳粹军在希特勒“灭绝战争”中所扮演角色的讨论。这些纪念碑在当代德国“记忆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代表了一种重新书写德国战争经验的公共叙述的努力。

墨尔本大学Julie Fedor的《国内和周边的俄罗斯记忆景观》(Russian Memory Landscapes at Home and in the Near Abroad)展示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作为公共记忆管理者的国家是如何在废墟中再造和控制记忆景观的。随着共产主义政权的瓦解,一个完整的象征世界在俄罗斯及其周边地区迅速坍塌,数以千计的苏联纪念物被拆毁或重新安置,一部分留存下来的纪念性建筑也不断遭到涂鸦、抗议和非官方拆迁,并不时成为暴力行为的导火线。过去的十年间,这一区域见证了一股记忆战争的浪潮,即俄罗斯官方当局试图重新控制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地区的记忆景观和纪念实践。作者以普京政权旨在控制、塑造和清除记忆景观的几次行动为例,对这场记忆战争作了深入的探讨,并对俄罗斯关于过去的官方话语与正在形成的国家意识形态之关系进行了反思。

## 结 语

近30年来历史记忆研究的长足进展和巨大影响,与这一研究领域的跨学科、跨地域、反思性、多元化等特征密不可分。笔者注意到,与会者中将近半数出生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伊朗、孟加拉、东帝汶、中国台湾等非西方国家或地区,或是波兰、民主德国等前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在西方世界接受学术训练,主要用英语从事研究和交流,其族裔身份和独特经历在其论著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与会者除大多具有历史学背景外,其论著还分别呈现出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学、艺术史等学科的色彩,并与性别研究、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等领域密切交织在一起。从参会论文主题之丰富、视野之宽广、方法之多元来看,这次研讨会既为历史记忆研究的诸般特质作出了很好的诠释,也为这一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积累了新的学术资源。

研讨会组织者之一、墨尔本大学的安东篱(Antonia Finnane)教授在开场辞中提出了如下问题:记忆和纪念研究者的知识来源是什么,或者说哪些学者为这一研究领域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资源?在各不相同的国家语境中,记忆研究有哪些共同的要素,又有哪些不同的特征?记忆研究的影响轨迹,是从西方到东方的单向传播,还是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与对话?这些问题当然不可能在一次研讨会中得到答案,但对记忆之根源与路径的方法论自觉,值得从事历史记忆研究的学者们深入反思。

(责任编辑:杜倩)